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二九八）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六四期 ——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511c)

【历史一页】“上海人民公社”名称使用和废止的内情	阎长贵
【往事回首】上将许世友与张春桥的“不解之缘”	舒云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历史一页】

“上海人民公社”名称使用和废止的内情

• 阎长贵 •

有的书说，1967年1月，上海夺权后，张春桥“先斩后奏”，把新政权称作“上海人民公社”。有的文章说，1967年1月，上海夺权后，张春桥、姚文元“别出心裁”，想为新政权取个新的名字，原想取名“新上海公社”，后来决定叫“上海人民公社”。还有的文章说，“上海人民公社”，是“张春桥取的怪名”。总之，不少人认为，“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名称是张春桥、姚文元自作主张使用的。这种观点和看法，不符合历史事实。回头来说，“公社”问题是“文革”错误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理论之一，影响广泛，是“文革”研究中需要探讨和反思的课题。

◇ 张春桥、姚文元是上海夺权的直接策划者和领导者

上海本来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在“文革”的酝酿准备阶段做了不少工作，却不知为什么又成了“全国全面夺权”的突破口和首选目标？这件事，我曾问过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他说不知道，也很纳闷。关锋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江青还做东宴请陈丕显（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他奉命作陪，后来怎么闹翻，陈丕显成为打倒对象，实在弄不明白。对陈丕显，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一位领导人过去是个红小鬼，居然会变化到这样，这我完全没有想象到。上一次开会时，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这一点叶群同志可以证明，伯达同志也知道，春桥和

文元同志也知道。可是他死不回头。”这段话的具体含义我们不得而知。对上海为什么首先夺权，我还问过其他人，都说不清楚。事实上，这迄今仿佛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开的谜。对这个问题，姑且不论。我只根据初步看到和掌握的材料，大体叙述一下1967年1月上海夺权，即所谓上海“一月革命”或“一月风暴”的过程。

说到1967年1月上海的夺权，有个人不能忽视，这就是上海夺权的前台指挥徐景贤。徐景贤1933年生人，17岁时，即解放初期就被调到上海市委，长期在张春桥领导下工作。1963年他担任了八届十中全会（这次会议作出要在全中国进行阶级斗争的决定）以后成立的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支部书记，具体负责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事宜。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在这个写作班子里完成的。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和任组员的姚文元到北京工作。这年的11月，张春桥、姚文元托人带口信给徐景贤：上海市委在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执行了错误路线，要他带头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徐景贤积极响应。1966年12月18日，“后院起火”，“心脏开花”，徐景贤带领写作班子的人造了上海市委的反，提出“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的口号，并发表《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造反声明》宣布：“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坏蛋的末日到了！我们——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全体工作人员和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徐景贤（丁学雷小组负责人）、朱永嘉（罗思鼎小组负责人）郑重声明：我们要造反！”这在全国省、市机关是第一家。由于徐景贤打头，上海市委机关各部门的造反派纷纷起来，他们同徐景贤的造反派一起组成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机联站”），徐景贤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个联络站的首领。徐景贤领导的“机联站”，“发号施令，人少权大”，他们又积极和王洪文等人领导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以及其他红卫兵组织联合起来，向上海市委和市政府进攻。徐景贤带头造反，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说：上海的形势很好，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现在机关干部也起来了。还说，“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这几个口号的提法有区别，好！”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身着军装以调查员身份回到上海。他们在接见徐景贤等市委写作班子的造反派时，张春桥说：写作班子的造反，在上海、在全国的影响都比较大，推动了全国省、市一级的党政机关干部起来造反。这次我和文元到上海来，是中央文革派我们来的。我们两个来了当然是和你们站在一起的，联络站就作为我们的工作机构。我们到上海来的任务，是做调查研究，然后向中央报告；所以我们不想介入上海的具体活动，同时，我们到上海来的消息，暂时也不想公开。接着，张春桥、姚文元又接见了王洪文等人，张说：“上海的两百万产业工人，是我们的基础。上海的工人阶级要能够左右上海的形势，工人运动不要受红卫兵特别是外地学生的操纵。这就是我和文元到上海以后首先要接见你们的原因。”张特别强调说：“现在对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了，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要害部门都控制起来，包括海港、铁路、电厂、水厂、煤气、电话等。”

以徐景贤为头的“机联站”和以王洪文为头的“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在1967年1月6日召开了约有百万人参加的“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大会的文件和发言都由张春桥、姚文元审查过；大会召开时，张、姚在他们秘密住处收视实况转播。在这次大会上陈丕显、曹获秋被揪到台上去，还有上海数百名局以上干部陪斗。大会宣布三项通令：

- 一、宣布从即日起不再承认曹获秋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 二、勒令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七天内向全市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
- 三、请求中央彻底改组中共上海市委，命令各级干部坚守岗位。

从这一天起，上海的党、政、财、文等大权，就实际地落到了张春桥、姚文元和上海几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的手里。

中央肯定和赞扬了上海的夺权。《红旗》杂志1967年第2期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评论员文章（《人民日报》1967年1月16日转载）说：“他们的经验是多方面的。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把上海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九大政治报告说：“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

◇ “上海人民公社”——上海新政权的组织形式。“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上海夺权并非“一帆风顺”。当时全国各地，到处组织繁多，派别林立，对要打倒的权力，往往是争过来，夺过去。上海也是这样。1月6日，上海夺权后，还经过多次反复，诸如，1月15日以上海市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为主的夺权；1月22日“上三司”的再次夺权；1月24日红革会的夺权——实际上是“夺印”，夺走了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机关，以及上海十个区的区委和区人委等23个单位的大印。“夺印”并不等于夺权，但夺了印带有很大的危险性，要是有人在出国护照上盖上钢印，可堂而皇之地跑到国外去；对此，张春桥、姚文元十分担心。他们想方设法做“红革会”的工作，要他们把印章交给上海警备区，再由警备区交回各单位，并提出召集上海各造反派开联席会议，商讨上海各造反组织如何联合夺权，以及新的政权机构形式和组成问题。经过曲曲折折的争斗，上海的“新”政权才初步稳定下来。

夺权后，“新”政权采取什么组织形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张春桥、姚文元曾经多次称赞过“上海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和“上海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这样的机构，认为它们实际履行了政府经济部门的职能。在12日举行的欢庆中央贺电（指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署名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誓师大会上，曾通过一项《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站的倡议》，其用意就是想以各群众组织的联络站作为新的上海政权机构的组织形式。这时又传来了最高指示，夺权后建立的领导机构，要有军队的代表、革命干部的代表和群众组织的代表三者参加，显然各群众组织联络站的形式不符合这个要求，所以它不能成为新政权的组织形式。

怎么办？1967年1月底，以徐景贤为首的各造反派在起草夺权宣言时，想到了巴黎公社，提出要把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写进上海的夺权宣言，主张“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公社委员由群众直接推选”，“公社委员是人民公仆，工资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等等。初稿写出后，即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这个宣言的起草，显然是受到毛泽东的话和中央文件的启发。毛泽东曾称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为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1966年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第九条说：“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又说：“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1966年8月21日出版的《红旗》第11期发表一篇署名文章，题目叫做《巴黎公社的全面选举制》，文章指出：“九十五年以前，法国工人阶级以冲天的革命精神，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创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宣布，一切领导者都由人民选举产生”，“它要求被选出来担任公职的人员，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而不是压迫人民的资产阶级的官僚政客”。“巴黎公社还规定，当选的公社委员同一切公务人员一样，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

资的薪金”，等等。徐景贤等人起草的上海夺权宣言所讲的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和原则，同上面中央文件和中央刊物上引述的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和原则一模一样。

2月3日（请注意这个日子！）凌晨，张春桥和姚文元召开了各群众组织主要负责人的紧急会议。张春桥一出场就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把你们紧急请来，就是要商量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大事。你们急着要建立自己的政权机构，急着马上就开成立大会，这种心情我和文元都是理解的，我们当然也是支持的。但是，一个新的政权的建立，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在这个权力机构里，光有你们这些群众组织的代表还不行，还应当有革命干部的代表。可是上海市一级的干部都没有‘解放’，那么，就算我和文元是革命干部的代表吧，我们的机构里还要有军队的代表，驻沪的陆、海、空三军究竟派谁来参加三结合的权力机构呢？他们三军的领导机关还得商量一下吧！”姚文元接着说：“成立新的权力机构这样的大事，我们还要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作报告。再说，召开这样大规模的成立大会，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张春桥说：“是呀，我们还应当发表一个像样的宣言，现在宣言的初稿写出来了，可是我和文元还没有来得及看，我们想要仔细推敲修改一下……还有，成立大会上各方面的代表要发言，我们也要讲讲话，这些都需要时间准备。所以，我建议成立大会是不是推迟几天？”王洪文急不可耐地站起来说：“上海人民公社开成立大会的事，我们已经布置下去了。我的意见大会不要延期太久，不然群众的情绪会受到影响。”许多人都主张趁热打铁，最后张春桥一锤定音：1967年2月5日下午在人民广场召开成立大会，正式宣布上海市新的权力机构——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

2月5日下午，上海一百万人参加了大会，宣布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张春桥在大会上致辞，说：“我们的一月革命，确实是伟大的人民革命。……这场胜利，如同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一样，将永远记在上海人民的心里。”姚文元发表演说，称：“上海人民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大会宣读的上海人民公社通令指出：“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会后，举行盛大的庆祝游行。游行队伍穿街过巷来到上海市府大厦。“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的牌子被摘下来，用铁锤砸碎，丢到火里烧掉，接着挂上了“上海人民公社”的新牌子。

“上海人民公社”诞生了！上海街道到处贴满了“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等拥护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大标语。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经过张春桥、姚文元“仔细推敲和修改”的宣言究竟有些什么内容。他们把徐景贤等人用的题目《从“十月革命”到“一月革命”》改为《一月革命胜利万岁！》，副题仍为《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其内容摘引几段：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地宣告：在伟大的一月革命的大风暴中，旧上海市委、市人委被我们砸烂了，上海人民公社诞生了！

——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彻底打碎已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专政权力的国家机构，重新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成立，是上海社会主义革命新的里程碑。

——伟大的上海人民公社万岁！

◇ 使用“上海人民公社”名称的源头不在上海，而在北京

上一节在写到“2月3日”时，我说“请注意这个日子”。为什么？我认为，这个日子清楚地表明，在“上海人民公社”问题上，张春桥、姚文元那时的“胆量”和“迫切心情”（说什么“把你们紧急请来”，“商量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大事”云云）完全是基于北京的信息。

谓予不信，且看事实。

1967年1月29日，陈伯达将王力、关锋为《红旗》杂志写的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送毛泽东审阅。1月30日，毛泽东作了如下批语：

林彪同志：

此件我看了，认为很好，并作了一些修改，请你看一下，退还陈伯达同志。

毛泽东
一月卅日

陈伯达得到毛泽东的批语，将社论的内容告诉了张春桥，还说：毛主席正在考虑建立北京人民公社的名单。并且，这篇社论，虽然《红旗》杂志第三期2月3日出版，但《人民日报》1月31日就提前转载了。在2月3日之前，这篇社论的内容，张春桥不仅听陈伯达电话里说过，无疑也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

《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社论，关于公社问题的有关内容抄录几段如下：

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长期盘踞的烂掉了的一些单位，他们实行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资产阶级专政。这些单位的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

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伟大的群众运动，已经开始创造并将继续创造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构的新的组织形式。在这里，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大胆地采取在群众运动中涌现的新东西，来代替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旧东西。而绝不能只是把权接过来，一仍旧章，按老规矩办事。

去年六月一日（确切地说，是8月4日——笔者注），毛主席就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宣传组组长、《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的作者之一王力，1967年1月31日（即《人民日报》提前转载这篇社论的日子），在人民日报同编辑人员谈到“公社”问题时说：现在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三方面协商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散着不行，这是临时的政府，是过渡，过渡以后就成立巴黎公社式的北京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

这就是当时北京关于“公社”问题的意见和宣传情况。张春桥是按照《红旗》杂志的社论去做，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说的观点去做，何以叫做“先斩后奏”？

◇ 废止“上海人民公社”，上海“新”政权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后，立即遇到了谁也想象不到的麻烦。上海夺权的前台指挥、后任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九届和十届中央委员的徐景贤，回忆当时情况说：

第二天（即1967年2月6日——笔者注），我们这些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成员就

进入外滩大厦办公。可是，左等右等，一连等了三四天，不见新华总社发布电讯，也不见《人民日报》刊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报道，只有上海的地方报纸《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天天在大肆宣传。于是，社会上的流言多起来了：“因为上海没有实行‘三结合’，所以中央不批准。”“毛主席不同意张春桥、姚文元当上海人民公社的领导人，所以不发消息。”……我心里当然明白不是这些理由，但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也搞不清楚。我对张春桥、姚文元说：“黑龙江省夺权以后，成立了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很快发了消息，还配了祝贺的社论，新华总社又转发给全国报纸刊登，为什么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消息他们没有发？”张春桥、姚文元不回答我。又过了几天，上海街头出现了《一问上海人民公社》、《二问上海人民公社》……的大字报，张春桥、姚文元也坐不住了；2月11日，张春桥把我单独找到兴国路招待所去，告诉我说：明天他要和姚文元到北京去一次，向中央汇报关于上海夺权和建立新的权力机构的事。张春桥再三叮嘱：这个行动只让你一个人知道，千万不要外传，免得在上海引起不必要的猜测；上海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到北京告诉我们。

徐景贤这个回忆很生动，很具体。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也说不清，道不明。实际上，这是毛泽东对成立公社的态度和看法起了变化。这种变化，可以从一些中央负责人和文革小组成员对这个问题即“公社”问题的一些说法中看出来。

1967年2月1日，戚本禹在接见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和北京市公安干部时说：最近正考虑成立一个联合组织“北京人民公社”，中央有这个意思，要进行筹备，要按巴黎公社原则选举它。现在中央文革在讨论，由谢副总理负责。可是过了12天，即2月13日，戚本禹给聂元梓、蒯大富打电话说：大联合组织，是否用北京公社的名义，希望你们商量一下。

2月10日，谢富治与三司等群众组织座谈时说：（各造反派）要成立一个过渡式的统一组织……上海起了一个人民公社，《人民日报》就没有发表，北京就不一定叫公社。

同样也是2月10日，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在接见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等群众组织时仍然说：北京叫“北京人民公社”，我们上海也叫“上海人民公社”。《人民日报》里有句话，不知道你们注意了吧！去年六月一日毛主席就把北京大学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

2月11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碰头会上，叶剑英责问：“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叶剑英又问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

2月12日张春桥、姚文元到北京，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12—18日），毛主席三次接见他们，关于“公社”问题的主要内容，张春桥在上海的群众大会上是这样传达的：

毛主席说：人民公社成立以来，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如果全国成立公社，那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改名？改的话，就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家承认你吗？苏联就可能不承认你，英、法倒可能承认。改了以后驻各国的大使怎么办？等等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现在许多地方都向中央申请成立人民公社，中央有公文，除上海人民公社外，其他地方都不许搞人民公社。主席建议：上海还是改一下，改成革命委员会，或者还是改成市委或市人委。

这是毛泽东关于公社问题的新态度新看法。这个变化，无疑是理智的、积极的。顺便说一

句，关于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新华社为什么不发消息，《人民日报》为什么不作报道，其原因也在这里。1967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明确地指出：

（一） 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夺权斗争的权力机构，叫什么名称？是不是真正做到三结合（即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党政机关真正有代表性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今后要先报告中央，经中央批准后，再在当地报纸上发表。

（二） 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城市的政权组织形式，除对上海中央另有指示外，一般的不要采用人民公社的名称。

1967年2月23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通过《关于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指出：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中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就上海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的名称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深深感到，这一指示充分体现了中央对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关怀，对上海人民的革命精神的最大爱护。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正确指示，一致通过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到这时，“上海人民公社”的名称也就被废止了。2月5日成立时被欢呼为“万岁”的“上海人民公社”，存在仅仅18天，就寿终正寝。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为上海新政权的组织形式。

◇ 笑剧收场，教训永志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开宗明义地说过这样一段话：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了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人们不难看出，也不难相信，在“文革”中被反复宣传的巴黎公社的原则和精神，也是这样一幅活灵活现而又莫名其妙的漫画。

1871年3月产生的巴黎公社无疑是一次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它表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英勇精神；它富有创造性，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并创造了无产阶级政权的一种形式；它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原则永存！至今尚存的巴黎公社墙还是世界各地劳动人民瞻仰的圣地。

在95年后，即1966年、1967年我们在“文革”中不遗余力地宣传巴黎公社，并仿效巴黎公社，情况又怎样？当毛泽东8月4日刚刚说过聂元梓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人民公社的宣言不久，即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那天），刘少奇就在天安门城楼上跟人说，他“自己把聂元梓的大字报反复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

十年“文化大革命”，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可以概括为“三全”，即：“开展全面阶级斗争，进行全面夺权，实行全面专政”。“三全”是“文革”内乱的根源，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实际上距离马克思主义何止十万八千里！“文革”中关于公社

的理论和实践是“三全”的重要内容，起了极坏的作用，教训沉痛。

第一，在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宣传什么“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是破坏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理论。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德文版序言中说，25年前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必须做出唯一修改的地方，就是经过巴黎公社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或者说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这是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我们在“文革”中使这个观点的宣传泛滥成灾，其目标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朝向臆造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掌握的各种权力。试想，在“文革”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还有各部门、各系统的权力，有哪一个地方不受到滥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论调的危害和破坏？多少干部被迫害死了，多少机关和组织瘫痪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没有一处安静的地方，即使中南海里也不安静。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宣传“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论调（顺便说一下，还有制造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政治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其危害不容低估，其流毒必须肃清。

第二，党内民主本来是党的生命，在“文革”中遭到肆意践踏。这一点，在“公社”问题上也表现得十分突出。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无论“上海人民公社”名称的使用还是废止（再强调一次，同提倡相比，废止还是对的，是改正一种具体错误的表现），都没有经过集体的决策。正如前面我们谈到，叶剑英曾责问：“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党内民主遭到破坏，既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也是“文化大革命”造成浩劫和种种灾难的重要原因。没有党内民主，就没有党的生命，这是用无数共产党人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宝贵真理，保证再不使它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损害，是每个共产党员的庄严责任和神圣义务。

第三，巴黎公社和对待巴黎公社本来是十分严肃的事情，我们在“文革”中却变成了处处成立公社。须知这决不是尊重公社，而是开公社的玩笑，正如马克思所说，是把它变成笑剧。其原因在哪里？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我们忘记和违背了科学，就在于我们忘记和违背了民主，还有，就是忘记和违背了法治。十六届四中全会，在讲加强和提高执政能力时，总结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消说，这三条最重要、最根本的执政理念，无疑也内在地包含了我们把巴黎公社的原则和精神变成笑剧的教训。今后，我们不论干什么事情，都千万不要忘记科学，千万不要忘记民主，千万不要忘记法治。无数事实证明，这三个千万不要忘记，是成功之道，是万全之策。让我们在这个三个千万不要忘记方面共勉！

□ 《百年潮》2005.8

~~~~~

## 【往事回首】

上将许世友与张春桥的“不解之缘”

• 舒 云 •

每个人经历的“文化大革命”都不一样。上将许世友因与张春桥老是冤家路窄，这使他的“文化大革命”别有一番“风景”。

1966年11月，北京的红卫兵席卷全国之后，上海造反派王洪文等人在安亭卧轨拦车。



中央文革派张春桥去上海处理“安亭事件”。他先斩后奏，擅自表态支持造反派，把上海市委推到了对立面，完全违背了周恩来的指示。但张春桥的阴谋得到上边的支持，直接为“一月风暴”埋下定时炸弹。1967年1月初，张春桥、姚文元在幕后指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大权。

接着，南京的造反派也夺了江苏省委的大权。来自全国全军的造反派云集南京，一夜间，南京街头贴满打倒“许大马棒”的大标语。第一批大字报，对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还“温和”，说他骂人打猎喝酒。许世友说，喝酒是好事，打猎熟悉地形，骂人嘛，我不光骂人，也打人，我一直在改。但“大字报”很快升级，造反派还抄了许世友的家，扎烂了他的上将礼服，还扬言要活捉（打倒油炸绞死枪毙）。而这一切，又得到了张春桥的支持。上边要求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许世友无奈，躲进大别山，但危险并没有过去。在张春桥策划下，造反派给许世友定了调子（许世友在延安就要杀毛主席，搞暴动，现在他又要做六省一市的头，不千刀万剐不足以平民愤）。

“文化大革命”越演越烈，全国开始揪“军内一小撮”。1967年1月3日，刘志坚（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总政副主任）被江青点名打倒。1月11日，贺龙（元帅、主持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成了“大土匪”，和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被阻在中央政治局的门外。彭德怀（免职的国防部长）、黄克诚（免职的总参谋长）、王尚荣（总参副总长）、袁子钦（总政副主任）等被抓走。北京召开了十万人批斗大会，陈毅（军委副主席）、贺龙（军委副主席）、李达（总参副总长）等被公开批斗，聂荣臻（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军委副主席）也“榜”上有名。7月底，总后大院召开五万人批斗大会，批斗彭德怀、黄克诚、许光达（国防部副部长）、杨勇（北京军区司令员）等20多名军队高级将领。接着，军队大院开始轮流批斗。

造反派有人撑腰，连中南海、国防部大楼都敢冲，各地的军事机关更不在话下。北京军区受到冲击，造反派甚至冲进保密室。韩先楚（福州军区司令员）给中央军委打电话，说首都学生到福州造反，弄得战备都无法搞下去了。再这样，我就上山打游击去了。沈阳军区报告，军区领导机关受到严重冲击，唐子安（副司令员）被造反派揪斗游街，施以肉刑，险些丧命。南京军区报告，军事院校的学生造反，占领了办公大楼，军区机关几乎瘫痪。军区的八个领导被揪斗、罚跪。许世友情绪非常不好，经常喝酒，声言如果有人揪他，他就开枪！

许世友是铮铮硬汉，谁不要命谁就上来。少年时他因打抱不平打死了老财的儿子，被迫背井离乡，到军阀吴佩孚手下当了一名下等兵。班长找茬说许世友的被子没叠好，左右开弓打他的耳光。在少林寺练过八年武艺的许世友飞起一脚，把那个鬼班长踢死了。

“文化大革命”初，外省来京开会的一大批高级干部，被保护在京西宾馆和三〇一医院。造反派上万人围攻京西宾馆，连冲了好几天，还扬言要用汽油烧掉三〇一医院。1967年8月25日，周恩来让宋任穷（东北局第一书记、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回辽宁工作。江青反对，指使造反派闯入京西宾馆抓住宋任穷和陈锡联（沈阳军区政委），从窗户吊到地面，并扬言往死里打。周恩来得知，命令傅崇碧（卫戍区司令员）把宋任穷、陈锡联从造反派手中抢过来，并指示将他们妥善转移。陈再道、钟汉华更惊险，造反派突破了警戒线，冲进京西宾馆一楼。在周恩来布置下，傅崇碧把陈再道、钟汉华藏在悬停的电梯里，才躲过一劫。

南京来了六七百名造反派抓许世友。警卫森严的京西宾馆进不去，就赖在墙外，人越来越多。许世友知道，到了造反派手里，不死也要扒掉几层皮。他看情况不好，敢死队长的劲头又上来了，挥着子弹上膛的美式左轮手枪，大喊我可不客气了，谁敢冲，来一个枪毙一个。这把美式手枪是从国民党军长那里缴获的，许世友不离身，睡觉时就放在枕下，给毛泽东守灵也

带着。卫兵拦他，许世友大骂，哪个王八蛋指示不能带枪，我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我怎么不知道？但是这么大的京西宾馆，除了许世友，只有韩先楚随身带着枪，一两把手枪怎么行？许世友坐镇中间大厅，把皮定钧、韩先楚等将军和工作人员组织起来，就地取材，张罗着把宾馆的热水瓶灌满开水，集中在两个楼梯口，同时关闭电梯，只要造反派冲到楼上，就扔“水雷”。

准备好了，许世友电话报告周恩来和中央军委，并请他们转告毛主席，说今天造反派来抓我。我革命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我不怕，抓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开枪！周恩来深知许世友说到做到的脾气，马上派徐向前到京西宾馆。同时，毛主席指示中央文革做造反派的工作，让他们撤回南京。

许世友一见徐帅，大声喊着，我许世友出生入死为革命，我犯了什么错误？中央批评我可以改，为什么要来抓我？为什么要污辱我？

傅崇碧事后说，要不是周总理工作及时，那一天非出事不可。

## 2

早在1966年8月，总参、总政就有规定，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更不得向造反派开枪，就是放空枪，也是政治错误，将要受到严格的纪律处分。

许世友知道造反派中的学生、工人都好对付，但是造反派中的复员军人就不可等闲视之了。这些人经过几年的军事训练，对部队是很大的威胁。要化“敌”为友，把复员军人从造反派中分化出来。12月3日，中央军委转发毛泽东、林彪同意南京军区党委紧急请示中的三条意见，1、一切转业、复员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兵或其他名义的单独组织，只应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革命组织。2、不准冲击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队，也不准到部队串连和散发传单。3、所有转业复员军人，必须保持和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并协助解放军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但是，“火”太大了，所有的努力都只是杯水车薪，许世友不得不住进指挥所。他像一头被困的狮子，很快从茫然到反感。那些被抓的将帅，哪个身上没有几个几十个“窟窿”？就说自己吧，四五岁就爬在牛背上，十几岁参加红军，怎么会是坏人？许世友让秘书电话请示中央军委，没有答复。秘书官小，许世友又叫王必成（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出面，还是没有答复。一天，张才千（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对许世友说，听说这几天造反派要抄军区首长家，许司令你小心点。许世友大吼，我活着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军帽戴不成，大不了回家戴草帽。他们要是把我逼急了，老子就开枪。到时闹出人命案子，看他们怎么办？

明人不做暗事，许世友马上口授一封电报，直接给毛泽东、林彪。大意是地方不能乱，军队更不能乱，军队要保持高度稳定，不能冲击军队。中央军委要尽快有个章法，你们不管，我被逼急了要开枪，开枪了就会血流成河。

沈阳、兰州、福州、广州、昆明、成都等军区的告急电报也不断飞向北京。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其中提到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1月28日，由徐向前提议、林彪口授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经毛泽东批准，终于颁布（其中第八条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增加的）。中心内容是今后不得以任何借口冲击军事机关，不准随意揪斗军队领导干部，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许世友高兴得喝起“茅台”，下令把“八条”连夜传达到每个指战员，尤

其三支两军者要认真执行。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更绝，经常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福建前线部队公告》，指出了执行好“三支两军”任务，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对不执行中央军委命令者，坚决实行纪律制裁。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将公告签发各军区、各军兵种、各基地并各总部，望参照执行。许世友看了，竖起大拇指，他最佩服韩先楚，说老韩的胆子比鸡蛋大。

1月26日，枪声响了。新疆石河子市的造反派和生产建设兵团发生武装冲突，被打死24人，伤74人。新疆军区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认为，这是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镇压了歹徒。而中央文革认为，这是一起镇压革命群众的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2月上旬，毛泽东书面批示，大意是决不容许右派组织肆意冲击部队，但处置要妥当。首先说服，如果他们硬要冲，可以放进来。他们占了一楼，部队退到二楼，继续说服。如果他们强占二楼，部队退到三楼；如果他们以为解放军的一再忍让为可欺，部队可以开枪自卫。但仅限于镇压带头闹事的右派骨干；对大多数胁从者，则重在批评教育，仍可放他们回去。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认为《军委八条》很好，并进一步规定，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包括军队和地方的战备、机要和保密系统。

2月23日，青海西宁市驻军联合办公室决定对报社实行军管，赵永夫（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任现场总指挥，确定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共伤亡377人（群众死169人，伤178人，部队死4人，伤26人）。青海省军区将情况向中央军委和林彪作了汇报。叶剑英听了汇报后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

有毛主席批示在先，对于“青海事件”，中央文革小组无话可说。

### 3

但很快“二月”成了“逆流”。老师们成了批判的对象。张春桥等人给毛主席写信，要求重新审查镇压革命群众的“青海事件”。3月11日，毛泽东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但左派右派谁说得清楚？明明是造反派先开枪，部队后开枪，但中央文革调查两次，还是把赵永夫抓了起来。要不是毛泽东说了句“不要杀”，就成冤死鬼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赵永夫才被平反。

张春桥的黑手遮天，许世友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军队的文艺和体育团体是中央军委批准开展“四大”的单位，这些内部造反派天天到机关贴大字报，揪斗军区领导。虽然事先得到造反派要冲击军区办公楼的情报，但戴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紧箍咒，正在召开工作会议的许世友急得团团转，无计可施。他听说陈再道落到造反派手里，“喷气式”不说，还被女造反派踹了一脚，瘫在地上。许世友无奈，给韩先楚打电话，说我们现在是走在山谷里，两面下来的石头都能打着我们，我们却是谁也碰不得，只能挺着挨打。落到造反派手里，只有死路一条，许世友下定决心，宁可跳崖，也不能进“虎口”。许世友对秘书说，中央文革小组有坏人，而且不止一个。小人得志，我摸透了他们的意图，他们不是在搞“文化大革命”。这个革命一点文化气息都没有，他们要打倒中国共产党，打倒忠于毛主席的领导干部。老子惹不起他们，还躲不起吗？

许世友布置吉普车停在楼后的桃（逃）山上。造反派冲进大门，许世友马上指挥撤退。坐进吉普车，许世友大骂，桃山，“逃”娘的山。他带着陶勇（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

兼东海舰队司令员)和聂凤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陆海空”一起躲到无锡太湖边上的小镇荣巷。

聂凤智是许世友手下的爱将,打仗不要命,宁折不弯。他胆子极大,从来没有摸过车,上去就开出20多里。开车有什么难的,正得意,四“脚”朝了天。打济南,主攻是人家十纵,作为九纵司令员的他擅自改成主攻,也不向上报告,一报告肯定“黄”。九纵面对的敌人最强,你助攻还可以,怎么能主攻?是不是命令下错了?三个师长一个接一个打电话,聂凤智说没错,就是要打乱敌人的阵脚。许世友偏偏支持他,两边都是主攻,好!两把刀子一齐往里戳,戳烂它的五脏六腑。八天八夜攻下城池坚固的济南,而以为济南能守三个月的蒋介石接到急报,根本不信,专门坐飞机到济南上空看了一圈。

陶勇是粟裕手下的第一战将,解放战争中,华东战区包括七战七捷在内的一系列大仗,他都是指挥员之一。粟裕曾说,不管多困难、多难打的仗,只要陶勇去,就能拿下。陶勇对海军前身华东海军的创建有巨大贡献,他也是1955年授衔的将军中惟一出征过远洋的将军。许世友非常欣赏这位能征善战的小老乡。

躲到小镇荣巷的军部招待所40多天了,陆海空三军司令员在一起,目标太大,风声传了出去。无锡军管会打来紧急电话,说南京来了几百名造反派,扬言要活捉许世友。无锡又呆不住了,许世友边骂边翻地图,看了好一会儿,对军长尤太忠说,这里紧靠上海不安全,我还是到大别山去。六安至金寨间的独山,30年代我们红四方面军在那里打过好几仗,那里的地形我熟悉。一旦造反派追到那里,我可以上山打游击。

许世友给中央军委发了电报,说到大别山检查战备工作。

许世友叫陶勇和聂凤智和他一起走,陶勇要回上海,聂凤智要回南京。许世友说,怕什么?脑袋掉了碗大的疤,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可是这两位爱将不想跟着许世友犯“错误”,还是执意回去。果不出许世友所料,他们回去都惨遭迫害。聂凤智受尽各种污辱,被打掉八颗牙齿,甚至被装进麻袋,要扔进长江。要不是许世友派警卫营半路“打劫”,聂凤智必死无疑。“文化大革命”后许世友对聂凤智说,叫你跟我走你不跟,逞英雄,回去当了狗熊吧?聂凤智不服,你当英雄是毛主席保你,你看那些老师,死的死伤的伤,许世友不说话了。元帅贺龙最后躲进中南海,还是没有逃脱,被关进西山脚下的一间平房里,73岁含恨去世。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逃到中南海,又逃到卫戍区,最后还是“束手就擒”……

陶勇比聂凤智更惨,1967年1月21日,被害死在东海舰队招待所后院的井中,遗体还被打上黑叉。陶勇的八个孩子中四个大的参加了工作,四个小的跪着求许伯伯救命。一片哭声中,许世友的眼睛也湿透了,说你们就是我的孩子,不管外面说什么,我要管!我希望你们考高中,考大学,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到地方去,你们都要遭殃,还是当兵吧。1967年不招兵,我的部队招兵。许世友把包括他自己孩子在内的40名落难子弟统统“锁”进“红色保险箱”。说我是从士兵打上来的,你们也要从最底层干起。他指着孩子们的新军装,你们都发“财”了,干不好,我把你们一个个都枪毙了。

十几年后,陶勇的儿子张小勇跪在许世友的灵前,放声大哭。

许世友指挥吉普车开了一天,顺利开进了大别山。到路口,他跳下车,前后左右仔细观察了地形,命令机枪封锁,说谁敢登这个坡,格杀勿论。造反派追来,看见黑压压的枪口和“军

事禁区，不得靠近”的大字，虚张声势喊过几句“打倒许世友”的口号，乖乖地退了回去。

许世友“名正言顺”住进了一二六医院（南京军区后方医院），他给中央军委发了第二封电报，说他神经性呕吐，顺便到医院住院治疗。他知道，电报发给中央，让张春桥那些内奸看到，等于向造反派公开了自己的行踪。许世友不敢怠慢，登山头看地形，拟订武装自卫方案，在医院内外布置好部队，时刻准备战斗。暂时没有敌情，每天由他亲自教练警卫班少林拳。50米外挂上靶子，练习打手枪。枪不够，就到山里砍木棒，板凳也可以当武器。

狡兔三窟，大别山深处有三个军队单位。几天后，许世友搬到五局，晚上又突然搬到军区工程兵工区。许世友对工区主任柴树林说，什么造反派？土匪流氓，一旦被他们捉住，只有死路一条。你们工区人人都要拿枪，一旦造反派来了，咱们打一个小规模的淮海战役。柴树林说，首长，上边再三强调，开枪……行吗？许世友一愣，转口说，当然，上边的规定还要执行，真要开枪还要经中央军委批准。这样，过几天你派人到六安向军管会打招呼，要他们说服造反派，不要随便冲击工区和医院，不然碰到我老许的枪口下，叫他们站着进来躺着回去！

好家伙，竟敢武装对抗造反派。第三天晚上，中央文革的电话“杀”了过来。许世友说，我有错误，在历次的军区党委会上做过检查，我是司令员，与他们没关。如果中央认为不行，我可以继续检查。但我是忠于毛主席的，把我烧成灰也是毛主席的人。……审查可以，不允许造反派搞人身污辱，国民党不行，造反派也不行。污辱我，这个矛盾就要转化，就是要转化。谁敢污辱我，我就打死他！……没什么冷静不冷静，我参加过七次敢死队，我怕什么？敢来就打死！……是我造反还是他们造反？我这是军事重地，部队听我的命令，保护我，我不同意，谁也休想来！中央文革让许世友去“参加”群众大会，许世友喊起来，我不去，我许世友要命有一条，受辱不答应！门外警卫班练拳的吼声响起，对方吓了一跳。许世友轻描淡写地说，没什么，我的卫兵在操练。……没什么意思，他们天天操练，一天没断过，军人就要常备不懈。

别看中央文革横行一时，但此时借给他们三个胆子也不敢进大别山。

放下电话，许世友走到门口，晃了一下，差点摔倒。众人七手八脚把他扶上病床。一检查，血压高的吓人，心脏也不好，还感冒了。几年前他到长江八卦洲打野鸭子，卧几个小时的冰雪，还浑身冒汗。而现在初秋还远，他在屋里已经深感寒意，升起小火盆。女儿许桑园在医院当兵，专门护理他。望着父亲憔悴的面容，感觉父亲的精神也有些垮了。

## 5

毛主席上哪里去了？他老人家为何不出来讲讲话呢？许世友心烦意乱，昨天说开窗干什么，怕别人听不见？今天关了窗，又说天这么热，关窗干什么？连点气也不透，再憋，人都要憋坏了。1967年8月，许世友决定到北京找毛泽东去。他坐车到了合肥，李德生（安徽省革委会主任、12军军长）说，毛主席正在南巡（7月至9月），估计不久会采取新的决策，扭转目前的形势。这样，许世友又躲进大别山。

很快，毛泽东南巡到了上海，明确表示要保许世友。毛泽东说，他没有谋害我嘛，我把他从（延安）监狱找出来的嘛。许世友呢？他在哪里？怎么不来见我？叫张春桥（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坐空军的飞机去接。代总长杨成武打电话给“藏”在大别山的许世友，我正陪“客人”在上海，“客人”请你出山。

“客人”是谁，许世友还用问吗？哪位“客人”能“劳”张春桥的大“驾”呢？

第二天，鹰钩鼻子耸着两肩的张春桥如约而至。

1966年，在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的力荐下，为上海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的张春桥很快担任江青的“副手”（第二副组长）。他非常“阴”，很少说话（就是在审判他的法庭上，他也以沉默为武器）。但只要他开口，话就非常凶狠。1967年1月，张春桥不止一次地说，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要改朝换代。

许世友恨透了张春桥，他认定北京有奸臣，第一奸臣就是张春桥。有人曾给张春桥编了个顺口溜，戴眼镜，夹皮包。许世友补一句，打起仗来往后跑（粉碎四人帮后，许世友说，我早就看出张春桥不是好东西）。平时，许世友很少与张春桥正面冲突，毕竟一个司令员，一个第一政委嘛。致使张春桥以为许世友软弱可欺，得寸进尺。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指定南京作为下放试点，张春桥代表南京表态支持。许世友气坏了，上海比南京人多，要搞下放到你上海去搞！但政治局多数票通过，许世友一气之下，把茶杯砸在桌上，好，你们都支持，责任我承担！1968年国庆节，许世友为南京长江大桥提前通车剪彩。事情过去好几年，张春桥却念念不忘，嫌通车典礼的纪录片突出了许世友。在党的“十大”分组会上，张春桥当面说许世友在华东搞“以我为核心”。许世友怒从心起，大骂放你的狗屁！电影不是我拍的，我也没看，我不要“以我为核心”，你才要“以我为核心”呢。1969年1月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参加，许世友列席。江青和张春桥极力诬陷南京军区、浙江省军区“搞多中心”，“独立王国”，是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矛头直指许世友。

为什么江青、张春桥都“抓”许世友的“核心”呢？1968年春，中共中央批准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在批示中特别加了一句“以许世友同志为首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当时全国的报纸正在大批特批“多中心论即无中心论”，只能用“以毛泽东为首”，别的省成立革命委员会，都没有以“某某某为首”。为什么对江苏省偏偏要加上“以许世友为首”？是不是江青、张春桥的故意栽赃？想把“有把的烧饼”塞到许世友手里？

这回毛泽东派张春桥来接许世友，是毛泽东的意思？还是张春桥的阴谋呢？路上被他害了怎么办？他想了又想，不见不行，见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许世友和张春桥在房间里单独谈了十多分钟，然后大家一起去吃饭。别看许世友“粗”，却“粗中有细”。他借机溜到隔壁，关紧门窗，压低声音对安徽省军区司令员、政委说，张春桥接我去见主席，是真还是假，我一时还难说清。我对主席“忠忠忠”，而对这个“四只眼”，我太不放心。万一半路被杀，你们帮我办两件事……安徽省军区司令员说，我看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吧？许世友两眼一瞪，你们的阶级斗争观念太差，张国焘你们见过？高岗、饶漱石你们见过？张春桥叫人看不透，我对他就是信不过。我拜托你们两件事，一是我死后，请照顾我的几个孩子，上学、当兵都行；二是十天内没有我的消息，赶快派人到上海收尸，把我运回老家新县埋了。记住，千万不能送火葬场！不等对方答应，许世友匆匆走了。

“藏”在大别山时，许世友就想到了死，他对护理他的女儿许桑园说，我年纪大了，现在又生了病，如果不行了，千万不要把我送到火葬场。你们一定要把我埋在爷爷奶奶身边，生时没有尽孝心，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憾事。忠孝不能两全，我选择忠。死后不能尽忠了，我去尽孝，我要守在父母身边。

一路平安到了上海，午饭时许世友照例喝了不少酒。饭后倒头就睡，从来没有午睡习惯的他睡得很香。14点多被叫走，与毛泽东足足谈了两三个小时。

一见面，毛泽东就说，世友啊，你还好吗？许世友二话不说，扑通跪倒在地，磕了很响的一个头，放声大哭。滚滚的痛苦都在这滚滚的泪水中。

这是许世友第二次给毛泽东磕头。第一次是在延安，差点儿被枪毙。有人把张国焘和四方面军混为一谈，许世友非常不满，什么兔子吃鸡（托洛茨基），狐狸才吃鸡呢。他被划到张国焘一伙，要不是毛泽东亲自给他松绑，他早就成了被“兔子”吃掉的“鸡”了。

许世友和毛泽东的交往可以追溯到长征路上的毛儿盖会议，毛泽东握着许世友的手说，我早几天就听说红四方面军有个和尚军长，很能打仗。你的名字是哪几个字？许世友说，父母起名叫许仕友，单人加一个士兵的“士”。当兵后知道“仕”是“官”，就改成红军战士的“士”。毛泽东说，我们再商量商量，把士兵的“士”改成世界的“世”，放眼世界嘛。许世友对毛泽东佩服得五体投地，常说我这个名字是毛主席改的。毛主席肚子里有墨水，站得高，看得远，想得全，从此就叫许世友了。

毛泽东连忙把大哭的许世友搀扶起来，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个样子呀？世友快起来，有话慢慢说。许世友大声说，还要不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毛泽东说，当然要啊。许世友说，天下大乱，从未乱到这种程度啊，军人手中的武器连烧火棍也不如了，这是什么世道？毛主席啊，你该管一管了。你知道谁是忠臣，谁是奸臣吗？毛泽东顿了片刻，反问，世友，我信任你，南京军区党委是可以信任的，你还是南京军区司令员，你怎么能扔掉“乌纱帽”呢？许世友说，我不要“乌纱帽”，你让我回家放牛吧。毛泽东肯定地说，军队要保持稳定，我们还是要依靠人民解放军。不许揪许世友，这是我的意见，我派人打电话给他们，你回去也传达我的意思，你看这样行吗？不，许世友坚决地说，什么时候打仗，我什么时候下山。毛泽东说，那你先到北京学习，许世友还是没有同意。他知道，这个“文化大革命”不一般。毛泽东批示要保萧华（总政治部主任），但萧华仍然被抓，家也被抄。七二〇事件后，毛泽东请陈再道（武汉军区司令员）和钟汉华（武汉军区政委）到北京谈话，最后还不是被关起来了。廖汉生（北京军区政委）和杨勇（北京军区司令员）也先后失去自由……

虽然有毛泽东一句顶一万句的当面承诺，许世友还是返回了大别山。

## 7

在张春桥策划下，南京借批陈再道（武汉军区司令员）的“东风”，正在筹备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批斗许世友的十万人大会。9月1日，周恩来打电话给江苏造反派，说中央要保许世友，如果有人要揪他，我一个小时赶到南京。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毛主席的指示。9月底，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许世友，毛主席请你来北京参加国庆。

周恩来怕许世友不相信，叫陈锡联跟他讲。

难道总理的面子还不够大吗？这中间有这么一个情况。许世友已经有过一次“半途而废”了。接到去北京的通知，许世友从六安坐车到合肥，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完全不是装的，恶心呕吐，嘴也紫了，脸也白了，满脸冒汗。病成这样，根本上不了飞机。许世友说，我不去北京了，我在后方医院很安全，请总理和老师放心。

自从“文革”以来，许世友一直对北京敬而远之。晚年他病重，怎么劝也不去北京住院，他说北京是政治漩涡，路窄人多，我“吵”不过他们。他深知自己火药筒的性格，一点就炸。有一段时间，南京传言总参谋长的人选是许世友。许世友坚决地说，我是丈二长矛，让我当总

长，我宁肯跳长江。

表面看许世友是直线思维，实际上警惕性非常高。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被刺杀后，许世友的警惕性更高了。医生用压舌板给他检查口腔，他以为是凶器，甩手就走，连病也不看了。他不怕“明枪”，就怕“暗箭”，因为在延安有过教训，被人绑起来，差点儿被杀，不能不谨小慎微。许世友在住宅院的东北角设计了一个两层“炮楼”，整个院子都在眼里。1966年11月12日，南京军区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会。平时开大会，许世友总是念一两页稿子就扔开，讲得生动活泼，很受官兵的欢迎。这一回，他原原本本地照着稿子念，念完后马上闭嘴，不再多说一句。军区常委开交心会，许世友说，把心交给别人，还能活命？每次开会他都要注意外面有没有造反派偷听。秘书认真记录，他怀疑了，为什么要记这么详细？是不是造反派的“内奸”？虽然上边天天有电报，要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可许世友早就看出“文化大革命”来不善，要留得青山在，只有天高皇帝远。

以后陈锡联对许世友的女儿许华山说，我含泪打电话，你爸爸不愿意到北京来，我真怕他开枪犯错误。周恩来深知许世友和陈锡联的生死之交，所以动员许世友进京，非陈锡联莫属。红四方面长征时曾三过草地，一次遭遇敌人，许世友抱起机枪就扫，陈锡联把许世友推到一边，抢过机枪，刚打一梭子，就负了重伤。许世友挑了30名身强力壮的战士轮流抬，说陈锡联要有闪失，我枪毙了你们。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许世友还杀了马，给陈锡联留了一大块最好的马肉，保住了陈锡联的一条命。陈锡联对许世友说，我们都在中南海，你也来吧。许世友保证，我一定去北京。你报告总理，我身体不好，爬也要爬上飞机。

1967年国庆节，许世友被毛泽东请上天安门城楼，谈了半个小时，并公开见报。这在“文化大革命”中非同一般，表明许世友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谁也不敢再找他的麻烦。之后许世友住进中南海40多天。每天没事，与李先念、陈锡联、余秋里等一大批避难的老将在棋盘上“杀”得不亦乐乎，过了一段“打仗”的日子。

1968年1月28日，周恩来为许世友上台大造舆论。他接见江苏省军区和地方群众组织代表，强调要解放干部，三结合要有领导干部参加，在宣读并解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时说，军队支工、支农的成绩是最主要的，他们已经检查或改正军队在支左中犯的“错误”，中央同意这个检查。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许世友同志是一位身经百战、久经考验的好同志，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立下了很重大的功劳，这一点必须肯定。

3月20日，中央批准了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同意许世友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

3月21日凌晨，周恩来与许世友谈话，嘱咐多多。

许世友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散江苏省境内的各种造反组织，并在一份文件上批，谁再造反，先杀后报！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许世友咬牙切齿地说，南京若再出现造反派，不用审批，统统杀光，一个不漏！

九一三事件前夕，1971年8月31日17点，许世友被专机接到南昌。毛泽东在湖南时，就叫汪东兴通知许世友和韩先楚到南昌来。汪东兴有头有尾讲了两个小时，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在湖北、湖南的谈话内容。当晚21点，毛泽东到达南昌，说既然车停好了，许世友也



刚来不久，那就干脆到住地谈吧。22点多，毛泽东同许世友、韩先楚等开始第一次谈话。

毛泽东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十次路线斗争都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毛泽东对许世友说，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许世友赶快声明，伪中央没有我，有陈昌浩等人。毛泽东摆摆手，表示并没有把许世友划到张国焘一伙中去。接着谈了陈独秀搞分裂，又说到去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说，许世友同志啊，你与上海、浙江的关系有些紧张，有些问题呀？许世友马上说，我与上海（张春桥）关系比较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春桥一直保我，一直为我说话，并且有我的大字报时，他还派人去覆盖。毛泽东说，覆盖不对。不应该覆盖嘛，让人家去看嘛，有什么关系呢？许世友又补充说，我与王洪文的关系也比较好。

当然，连坐在一边的汪东兴都听出来了，许世友说的并不是心里话。但在那种时候，他这样说又怎样说呢？毛泽东说，你这个许世友呀，应该高抬贵手，刀下留人。汪东兴注意到，许世友听到“刀下留人”，非常紧张。许世友连忙说，哎哟，我和南萍（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的关系请中央派人来调查。浙江问题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深，1969年1月8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1月4日周恩来与许世友商定先解决浙江问题），包括许世友在内的南京军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浙江省军区等10位领导干部参加（名单由许世友拟定，并由周恩来报毛泽东批准）。毛泽东要双方多做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如今两年多过去了，浙江的武斗仍没有停止。毛泽东问许世友，据说舟山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你这个司令员有没有责任呀？那样搞武斗，南萍有责任，但都是南萍的责任吗？

毛泽东转身与韩先楚又说了几句，韩先楚的情绪比较轻松。毛泽东说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毛泽东对许世友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

毛泽东屡屡提到张国焘，尤其在这种时候，实在让许世友心中不安。他转移了话题，说主席呀，有“五一六”分子怎么办呢？毛泽东说，怎么又谈到“五一六”啦？许世友说，“五一六”在南京相当厉害。文凤来是“五一六”分子，这个人到上海，要毒害毛主席。毛泽东问，毒害我的事，你们查清楚了没有呀？许世友回答不上来。毛泽东说，这件事，你们要查清楚，不忙作结论。接着毛泽东问许世友，你们南京军区不是有一个有名的王林鲍（王必成，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鲍先志，南京军区副政委）吗？还有别的人，他们都是造反派吗？许世友说，他们都是造杜平（南京军区政委）的反。毛泽东问，他们为什么不造你的反？许世友说，不，他们不造我的反。毛泽东说，你这个地方缺少一个“宰相”。“宰相”很重要啊，我准备另找一个政委帮帮你的忙。谈话进行了一个半小时，时间已经指向零点，毛泽东要汪东兴组织许世友他们先座谈一下。

许世友和韩先楚都是“打猎迷”，这两位好朋友难得碰到一起，9月1日下午开完座谈会，他们就高高兴兴打猎去了。

连日奔波和谈话，毛泽东感冒了，发烧38度多，晚上卧床休息。9月2日上午8时，毛泽东起了床，说我们要走了，怎么办？汪东兴说，您看呢？毛泽东说，还是见他们一下吧。汪东兴马上通知许世友、韩先楚等，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他们了。汪东兴急得够呛，心想这下糟糕了。半个小时后，才摸到他们的行踪，马上派人把他们“抓”了回来。

这一次毛泽东与他们的谈话时间不长，只有40分钟。毛泽东说，今天我要走了，汪东兴向你们传达我在路上的谈话，你们也谈了谈。昨天座谈得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意见没有？韩先

楚没有“包袱”，抢先说，我在座谈会上说，要听毛主席的，九届二中全会我们大家都起了哄，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做自我批评，请主席放心。（说到庐山会议，许世友也还是有理直气壮的地方。在庐山，毛泽东让许世友摸他的手，说我的手凉，脚也凉，你回去做做工作，我不能当国家主席。许世友马上四处做工作，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违背他老人家的意愿，又不利于党的事业，是完全错误的。）许世友请示说，主席，您到浙江找不找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与南萍的矛盾）？毛泽东说，不谈这个问题，到浙江不谈这个问题啦！许世友问，那我回去吗？毛主席说，你回南京去吧，下午我也走了。

9

9月10日22点前，毛泽东的专列从杭州抵达上海。在杭州出发前，汪东兴就打电话通知了在上海的王洪文（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并叫他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越快越好，“客人”要同他们谈话。专列一停，汪东兴就下车去接，只有王洪文一个人，许世友没到。汪东兴把王洪文引进车厢，毛泽东问，东兴同志打电话给你，要你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怎么没有见他来呀？王洪文说，电话我打了，南京说他可能下乡了，正在设法与他联系。毛泽东只与王洪文说了几句，说等许世友来了一块谈。

王洪文马上下车再打电话，“客人”急着要见许世友。此时许世友正在扬州，连个准确地址也没有，只得求助扬州市委，这才通知到。车程七八个小时，许世友不敢怠慢。回到南京，劈头就问，飞机到了没有？秘书说是值班飞机，许世友马上批评，毛主席讲话（8月31日）你也听到了，怎么要值班飞机？秘书回答，没有专机。许世友亲自打电话，确实没有。9月11日上午10点，许世友坐值班飞机赶到上海。

毛泽东住在专列上。一群人去见，汪东兴把王维国（空四军政委）挡住了，你去休息吧。许世友的秘书注意到，王维国被“定身法”定住了，愣了好几秒，才转身往外走。这时，时间好像非常紧急，毛泽东马上开始与他们谈话，简要谈了一个多小时。汪东兴分析，一是毛泽东等得太久，二是毛泽东在南昌已经谈过了。所以，汪东兴只是简单做了记录。

毛泽东问，许世友，你下乡啦？去搞什么呀？调查什么问题呀？许世友说，我去看农场，看大别山附近的军垦农场去了（实际上打猎去了）。毛泽东问，去那么远了呀？许世友说，坐吉普车去的。毛泽东批评说，怎么连家都不回呀？一天到晚，你这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怎么行呀？向谁请了假呀？要是万一发生问题，你怎么样办呀？连南京军区都找不着你！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意，告诉一下家里嘛。许世友说，真对不起，我想主席还会在杭州住几天的，然后才能到我这里。我昨天夜里零点多才回到南京（其实第二天上午9点多才到），先休息了一下，就没打电话到上海。接着许世友大概是为了打消毛泽东的疑心，汇报说，今年农业可能会大丰收，军垦农场也不错，庄稼长势很好，丰收在望。毛泽东说，那好嘛，你去看看农业也好嘛。许世友说，军队的情绪很好，军队里比较稳定，乱哄哄的情况也过去了。我带着那些造反派游过苏北。毛泽东问，是不是都是支持你的那一派？许世友说，我把两派都带上了。毛泽东再次强调，不能把领导机关搞乱了，更不能把军队搞乱了。我在江西就同你讲了，要“高抬贵手”。许世友说，不会，我正在做他们的工作。毛泽东说，那好。

王洪文埋怨许世友，主席等你快等了15个小时了。毛泽东马上打断，不要这样，不要紧嘛。这段时间我们也休息一下，不要提了，我们还是谈正事。对庐山会议你们想得如何呀？是不是在思想上解决了问题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是不是能解决了呀？我认为犯点错误是不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对有些问题还认识不到嘛，那就等待，耐心地等待嘛。认识一点就写出来，以便改正错误。许世友说，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毛泽东说，我有什么指示呀？许世友说，您的指示就是《我的一点意见》。毛泽东说，那个不是在

后头吗？是你们犯了错误后，我想了五天才写的。你们是什么时候讲的，是24、25、26日三天嘛。许世友坚定地说，这个指示我拥护，我就是按您的意见办的。毛泽东说，不见得吧，我那个意见你学了没有？我那个意见上说，什么叫唯心论，什么叫唯物论，你讲一讲，我听听！许世友哈哈笑起来。毛泽东说，你不是说执行我的那个指示吗？我要你们学习，你们又不动，人家要搞那个“论天才”，找了几条称“天才”的语录，你找到了吗？王洪文看许世友没再说什么，就开始汇报。毛泽东再一次点了林彪问题的实质，接着又重复讲到党内历次路线斗争。

11点多，毛泽东说，我今天不留你们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你们都去。汪东兴送他们下车，王维国在车门口等着，王洪文把他拉上车。毛泽东对王维国非常冷淡，只在车厢门口与他握了一下手，连话也没有讲。送走他们，毛泽东立即对汪东兴说，我们走。

王洪文请客，说叫上王维国，许世友没有表示不同意。王维国也就一起去了，等了好长时间，饭才上桌。饭桌上非常沉闷，平时七八瓶茅台还不够，今天一瓶也没喝完。吃到一半，保卫人员告诉王洪文，毛泽东的专列走了。许世友非常惊讶，匆匆结束饭局，与众人一一握手，握一个说一句毛主席的“三要三不要”。握到王维国，说了一句“不要搞阴谋诡计”。事后秘书问他，是不是有点点题？许世友说，毛主席说这个人（王维国）不好。

15点多，许世友赶到南京火车站，想再见毛泽东一面。专列在南京停了15分钟，但毛泽东没见。只有汪东兴下车见了一下许世友。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说，不见，什么人都不见了，我要休息。

9月12日，许世友哪里也没敢去，守着电话一动不动。一夜“安静”，9月13日早晨5点，周恩来电话，要求加密。加了半天加不上，周恩来说，就这样吧，庐山上第一个发言的那个人跑了。怕许世友反应不过来，周恩来又补了一句，“老病号”跑了。许世友马上就明白了，似乎早有预料（韩先楚却一时没明白周恩来说的“老病号”是谁。周恩来又说，就是第二个张国焘嘛，韩先楚还是不大明白）。

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许世友想也没想，马上说，我起兵造反。他马上按军委命令布置一级战备，派陆军看住战区内所有的飞机、舰艇。舰艇一个人开不跑，一个人却可以把飞机开上天，许世友下令把卡车开上跑道。

## 10

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九一三事件查到了许世友的头上。

江青和张春桥终于揪到许世友的小辫子了，真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

1972年12月25日，许世友被叫到北京。搜查毛家湾时，发现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写的信。一、拥护林彪的讲话，二、拥护毛泽东关于对犯错误的人不点名、不揪人的指示，三、建议犯错误的人要检讨，对错误要进行批判，要调离中央，下放到基层做实际工作，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这些信为什么到了毛家湾林彪那里？

许世友回答，我们是写给中央军委的，至于怎么到了毛家湾，我怎么知道？但是江青、张春桥揪住了三大司令员的三大问题，1、信上说“犯错误的人”指的是谁（张春桥）？2、为

什么信到了林彪那里（上贼船）？3、为什么三大军区司令员一起写信（串连）？许世友说，我们的信通过中央办公厅转毛主席和林彪，为什么在林彪手里？要问中央办公厅。至于信中说谁是坏人，事情过去两年多，忘了。

其实，坏人是谁，许世友怎么可能忘记？首先就是奸臣张春桥，还有江青。江青请许世友看样板戏，许世友不去，说看过几百遍了。江青又请许世友吃饭，许世友说拉肚子，还是不去。气得江青说军中“两霸”，一是许世友，一是韩先楚。毛泽东去世时，江青还想围攻许世友，许世友拍案而起，说你张狂什么，主席在我让你三分，现在你再胡言乱语，我敢揍你。对于靠造反“暴发”的张春桥，许世友就毫不“客气”了。九届二中全会华东组会议上，陈励耘（空五军政委）面对面地抨击张春桥，虽没指名，许世友全听明白了，没等他讲完，许世友就大声说，老陈，你讲得对！我同意你的意见！叫他到他管辖的江苏农村劳改！而张春桥阴着脸，一个劲地记录，准备秋后算账。

1970年8月26日，庐山会议各大组传达完毛泽东关于对犯错误的人不要点名，不要揪人的指示。韩先楚去找许世友。许世友正在看南京军区的一封表态信，心情非常好，说那个“鱗鱼眼”（张春桥）的寿数到了，我再补他一枪。韩先楚也说，我也补一枪。所以福建军区的表态信与南京军区差不多。

此一时彼一时，如今张春桥“大翻身”，正炙手可热。好汉不吃眼前亏，许世友当然不能说坏人是张春桥。可是坏人是谁呢？秘书提醒了一句，许世友“想”起来了，毛主席与他谈话时，说到陈伯达是坏人。对，我们信中指的坏人是陈伯达。

谁知道能不能瞒天过海呢？毕竟是块大大的“心病”，许世友血压陡升，心绞痛也犯了，住进三〇一医院南楼。到北京七天，住了五天医院，许世友想快快“逃离”北京。经中央同意，1973年元旦他回南京休养。一回南京，许世友马上召集常委会，写检讨电报。他说，庐山那封信是大家写的，我同意签发，有什么事我承担。没什么偏差，就是言词过激，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不应该。许世友说，林彪当国防部长时，我去看过几回，带过几次野鸡野兔。他给毛泽东写了个人检讨，批林整风会上也检讨不止。

中央没有查出三大司令员串连，韩先楚、杨得志先解脱了。5月初，毛泽东派李德生、韩先楚到南京来做许世友的工作，给他定心丸。你与林彪是一般工作关系，不了解，最多是上当受骗，不要上纲上线。

许世友终于“解放”，但江青和张春桥仍在寻找机会，置许世友于死地。

## 1 1

1975年，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给各大军区、军兵种的领导打“预防针”，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现在有个“上海帮”，你们要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江青等人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给海军、空军、南京部队、广州部队等领导机关写信，派亲信到部队送“材料”。许世友非常清醒，根本不理睬她。

1975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开完，接着开四届人大。一天晚上，许世友来看杨勇，关上门，谈了两个多小时。许世友临走，拉开门气冲冲地说，你怕死！你怕死！一甩手走了。杨勇的秘书李增林忙问怎么了，杨勇说，他对江青和张春桥意见很大，气得鼓鼓的。我怕他放炮，劝他忍着点。对江青、张春桥这类小人，要针锋相对斗，但不一定把话都讲出来。就因为这个，他说我怕死。李增林说，是不是找许司令再谈谈？杨勇说，不用，我了解他。你不信，

明天他准保来找我。果然第二天一大早许世友来了，站在门口直着嗓子说，老杨，你说得对，照你的办！说完噤噤噤下楼散步去了。

但是再三再四的小心，江青、张春桥还是揪住许世友不放。

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他认为几位军区司令员或多或少有点问题，但批林批孔中贴出的大字报没有什么新内容。毛泽东提出分别找他们个别谈谈就行了。后来他改变主张，由政治局主持召开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解决”李德生、许世友、韩先楚等同志的问题。会议将政治局委员和军区负责人编成几个小组，每组“批判”一个人。这时周恩来已经病重住院，江青、张春桥利用毛主席说的几位军区司令员或多或少有点问题的话，对他们大肆攻击，想把他们划到九一三事件中去，强迫他们作“深刻”检查。不检讨？会议就没完没了地僵着。李德生、许世友、韩先楚等不得不违心“检查”，批判会这才姗姗结束。

他们的“牺牲”，总算遏制了四人帮想在中央制造更大阴谋的势头。

## 1 2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亲自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建议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当时全国有11个大军区，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任职的时间都不长，原地不动。北京军区李德生和沈阳军区陈锡联、济南军区杨得志和武汉军区曾思玉、南京军区许世友和广州军区丁盛、福州军区韩先楚和兰州军区皮定钧，相互对调。毛泽东说，我想这个问题想了好几年了。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接连几天，毛泽东就这个问题同政治局成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12月22日，中央军委宣布邓小平参加中央军委的工作，同时下达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12月29日，周恩来召集在北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有关负责人开会，由王洪文点名。王洪文来自上海，许世友与王洪文（小毛孩子嘛）没有更多的冲突，平时许世友对他还算客气。刚当上“接班人”的王洪文还不懂天高地厚，他先点许世友，许世友不说话，眼睛翻到天花板上。许世友在南京呆了20多年，根本不想到什么广州去。但军令如山倒，他不能不服从。王洪文提高嗓音，再点许世友，许世友一声巨响把茶杯摔到桌上。王洪文没办法，回头望着毛泽东，毛泽东一声不吭。周恩来接过命令，从其他司令员点起，才算让王洪文下了台阶。12月30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新调任的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出席各地的元旦联欢会，并由新华社公开报道。

后来，许世友对调到广州军区非常高兴，不到广州还捞不上仗打呢。他就是爱打仗，或者换句话说，他就是为打仗而生的。什么战术？打进去就是战术。谁要打不好，提头来见。有一次传错了命令，部队没前进反而后退。他急得大骂，真是一伙蠢猪。不行，非要他们打，打不好统统杀头。马上就要打了，下起大雨，下边请示，许世友问，下刀子不下？不下刀子就打！他当师长军长时还经常背着大刀与敌人拼杀，红军扩编时，许世友连升三级，从团长直升到副军长兼师长，靠的就是赫赫战功。1981年7月，许世友回忆，我当战士时，打了几十次仗才当班长，当排长时打了百把次仗，当连长打了三百次仗，到当团长时已经打过上千次仗。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庆功大会上，许世友说，我这个人带兵以来，部队从来是活不交枪，死不丢尸，这是老红军的光荣传统。

许世友从红军大学毕业后留校。他辗转向毛泽东提出他要上前线，被任命为山东省军区司

令员。抗战胜利后山东赴东北的六万多部队大部分走的海上，许世友是海运总指挥，成了看客。许世友真想一甩手，跟着队伍上东北。忍了几天，他去找萧华，说看样子东北要打大仗了，我求你让我跟你们一起到东北去。萧华说，你一个大司令，怎么能说走就走？许世友说，那有什么，你随便给个官，大小无所谓，只要有仗打就行。萧华说我可没有这个权力。许世友说，那你和罗（荣桓）政委说说。萧华说，你就别乱弹琴了，几万部队渡海，没你许司令，船从哪来？棉衣从哪来？提到棉衣，许世友笑了，说我还为自己留了一套厚厚的黑棉衣。萧华说，我也是来之前才接到去东北的通知，没准哪天你那套棉衣就派上用场了。许世友无可奈何，那好，你就等着在东北接我吧。等到东北解放，许世友也没去成东北，好在很快山东也有了仗打。

话说回来，如果许世友去了东北（四野），不知后来是祸是福？

全国解放后，许世友就没有仗打了，手直痒痒。到广州军区任职不久，许世友就指挥了1974年西沙自卫反击战，大获全胜。1979年他又指挥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广西战区），同样是大获全胜。对越自卫反击战是抗美援朝之后的一场大仗，叫许世友赶上了，瞧这运气，否则他就只有在南京眼巴巴当看客了。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上，常胜将军许世友是亲临前线年龄最大的指挥员。

但是战后，由于疲劳过度，许世友猝然病倒，血压高，全身浮肿。

### 13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一网打尽，许世友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喝了个一醉方休。他想起“文化大革命”前老韩到南京，拉他去钓鱼。吃鱼哪有钓鱼香？老韩“钓”，而许世友却坚持“网”，他没有那份耐心。“文化大革命”中又说起钓鱼，许世友说，只要你能把张春桥这条“鳙鱼眼”钓上来，我就不再“网”，跟你慢慢“钓”。现在“鳙鱼眼”终于被“钓”上来了。

1976年12月底，杨勇和罗瑞卿飞往广州，为邓小平复出大造舆论。他们走访了汕头、湛江、深圳、澳门等地，还去了万山群岛，在海南岛的三亚过的春节。最后转到广州，住在留园。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以东道主的身份请杨勇一家吃饭。杨勇的二儿子冀平和三儿子北北正在广州休假，加上一直跟着杨勇的女儿京京，三个孩子跟着杨勇热热闹闹地去了。

许世友和杨勇关系不错，平时天南地北，只要开会碰到一起，就打打闹闹。有一次，许世友高兴，握得杨勇的手生疼，还摆开架式要和杨勇摔跤。大家都说杨勇要吃亏了，许世友也知道杨勇不是他的对手，运足了气，把杨勇抱起来抡了整整两圈，才兴犹未尽地放下。杨勇的腿在关押时摔折过，拿着根拐杖。许世友见了，大声说，你在我面前装什么老（许世友大杨勇七八岁），他可不管杨勇腿好不好，总之不能让杨勇冒充老头。

客人一落座，菜就紧忙着上了桌，这是许世友的风格。许世友请客很有意思，只要打到野味，就用野味请客（南京方圆百里的野鸭子都被他打光了）。没有野味，就全是家常菜，用最大号的脸盆盛着（一脸盆冒着尖的油煎鸡蛋，一脸盆小虾米，还有一脸盆肉）。许世友请客，不重视菜而重视酒。喝酒是他的第一爱好，没饭吃可以，没酒喝可不行。他常说，冷酒伤肝，热酒伤肺，没酒可就伤心了。红军时期红四方面军曾颁布戒酒令，许世友例外，挂在床头的水壶里装的是酒，说不喝酒，腿没劲。有人不服，张国焘说，你们谁能比过许世友的酒量？能比过，就可以喝。

打胜仗，请部下喝酒，这是许世友的最高奖赏。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庆功宴上，

许世友连敬三杯茅台，第一杯希望大家好好庆祝一下，第二杯祝大家再立新功，第三杯祝愿你们永远爱祖国，永远当英雄。三杯酒下肚，许世友眼尖，看见有人没喝，说我给大家讲个故事，玉皇大帝不知人间的痛苦是什么，派天官调查。天官在很多地方看到的都是快乐，上哪找痛苦呢？这时他看到几个人喝酒，有一个人喝得很困难，他才明白，看来人间最大的痛苦是喝酒哇。许世友很会劝酒，家属不让，怕老婆；身体不行，怕死。只得喝，喝了，还要说，能喝不喝，弄虚作假，罚三杯。但如果你真醉了，下次他就不再劝。

此时杨勇已经不能喝酒了，60年代以后他得了过敏性肠炎，一喝酒就拉肚子。许世友说，你不喝，我喝。喝水般喝了一阵酒，喝舒服了，许世友说，我的部队都拉到山上去了，野营拉练。意思是，没问题，我全力支持你（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许世友知道，邓小平出山，宣判张春桥、江青政治死刑的日子就不远了。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丁凯文（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             |          |
|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             |          |
|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             |          |
|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             |          |

---